

IP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论丛

中俄体制 转型模式的 比较

关海庭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关海庭 著

中俄体制 转型模式的 比较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旨在通过对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和俄罗斯(苏联)体制转型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分析,特别是传统文化和现实观念等制约因素的分析,论证大国体制转型渐进优于激进,并揭示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俄罗斯的“激进”转型模式,先以政治“公开化”为突破口,当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生产逐年下滑之后,又开始推行“休克疗法”,大规模的放开价格和全面私有化,打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导致生产下降和国家财政能力弱化,加之政治纷争和文化的对立,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冲突,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中国的“渐进”转型模式,合理地选择了体制转型的起点和具体方式,使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得以提高,人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培育了市场观念,又为转型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本书阐述了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深入发展的途径:依法治国和体制创新,克服权力市场化,提高国家的控制能力,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构建新型的政治文化等。

作 者 简 介

关海庭 男,1954年生,满族,吉林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地方党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俄体制转型的比较研究。独立与合作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大国转型发展之路——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学》、《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毛泽东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探析》,并在《北京大学学报》、《当代中国史研究》、《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是我从事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比较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本书的价值,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评判。但值得欣慰的是,在十余年的专题研究中,虽然“筚路蓝缕”,但为了开启中俄体制转型比较研究这片“山林”,我曾付出了几尽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我曾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莫斯科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当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辽阔的国土,并实地考察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伏尔加河沿岸的各大城市之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俄罗斯那些良好的基础设施:莫斯科地铁、莫斯科运河、造型迥异且宏伟的俄式建筑、大城市周围呈蛛网状密布的电气火车、伏尔加河沿岸的水利枢纽,这一切有力地昭示着俄罗斯的大国风采。不仅如此,透过这些基础设施和塑在上面的浮雕,使我感受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冲天的劳动热情和凯歌高奏的时代气息。但遗憾的是,如今这些基础设施的状况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陈旧。比如以罗蒙诺索夫的名字命名而雄踞世界一流的莫斯科大学,其宏伟(据说有一万多个房间)的主楼,现在呈现出一幅破败的景象:门窗缺损、水管漏水、墙壁脱落、地板斑驳陆离。其实这类建筑的维护,并不需要很多的经费,稍加翻修,就能再现昔日的辉煌。然而俄罗斯需要维修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国家拿不出钱。更令人担忧的是,政治纷争和价值观的冲突已经在严重阻碍着国家经济的复苏。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上很少能看到俄罗斯民族特有的豪迈与奔放,呈现给外人的只是沉重与迷惘。苏联的解体让我再一次领悟和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什么原因把俄罗斯推向这种境况呢?由此,我想到了国家控制能力问题。大国,特别是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原来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和提高国家的控制能力,包括财政能力、法制化能力、国民文化的整合能力,应当

说,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从1994年开始,我便着手研究这个题目。当我刚一涉足“国家控制能力”这个领域,便立刻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因为这个题目太宏观,必须运用大量的实证材料。因此,1995年回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便把“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作为主攻方向。1997年在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资助后,又进一步把题目确定为“当代中俄体制转型与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大约在1998年3月,我写出了论文和结项报告的初稿。

说心里话,我自己对论文和结项报告的初稿并不十分满意。文章还缺少必要的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资料。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于1998年9月第二次赴莫斯科大学。而这次莫斯科大学给我的印象恐怕要用三个字来概括:更陈旧。楼还是那座楼,路还是那条路,房间还是那些旧房间,只不过需要维修的地方更多了。分给我的房间,水管在滴滴答答地漏水,窗户上玻璃少了五分之一。入住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修理水龙头,用纸壳糊窗户。当我再度漫步莫斯科的城区时,我的强烈感觉只有一个:现在的俄罗斯还在吃斯大林时代留下的老本。老本吃光了,还吃什么呢?这使我产生了对“国家控制能力”问题研究的紧迫感。然而真正使我坚定信心的,是我与俄罗斯学者形成的共识。第二次赴俄的第五天,即1998年10月3日,俄《独立报》发表了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罗戈夫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在我国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增长。但主要的不幸在于,我们国家预算实际上崩溃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它的预算数目却少于奥地利或比利时,而美国的国家预算高于俄罗斯40倍。”

从那时起,我便更广泛地收集资料,购买有关书籍,订阅《独立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每天夜间进行翻译和写作,把大量的、最新的统计数据和民间调查资料加以分析后充实进了论文和项目报告中。12月的莫斯科可谓是“大雪封门”,我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几乎每天都写作到凌晨2点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许多资料都一再地证明了我的理论假设,这让我无比兴奋。对此,我由衷地感谢读博士期间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是他们给了我政治学理论分析的框架,使我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得以提高和拓宽。由此我更加感到,一个民

族如果没有理论高度,这个民族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学者,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就不会有发明和建树。比如在国家控制能力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仅从俄罗斯经济基础好,国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都很高的直观感觉出发,就会认为其体制转型应该更容易;而中国经济基础差,国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体制转型难度会更大。但为什么实际结果和人们的直观感觉不一样呢?这就需要理论思维,需要对本质和现象加以理论剖析。

在运用理论思维论证渐进转型模式合理性的问题上,我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1999年6月,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不久,我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以《大国转型发展之路——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为书名,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我为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开设“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选修课。在授课过程中,我对两件事情记忆犹新:一是政府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对我提出的渐进转型模式合理性的三个论点逐条进行“挑刺”,使我不得不对这些论点进行修改和完善;二是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名学生对中国家庭生产的传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使我深受启发。我从中真切体会到“教学相长”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授课讲稿的基础上,又经过两年的充实,我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大约是在2001年前后,本书就已经基本定稿。我记得一位名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文章写完之后不要急于发表,先搁置到抽屉里,让时间清洗其中的污点。我照此办理了。此后,我研读了《俄罗斯文化史》、《叶卡捷琳娜传》等多部有关俄罗斯历史方面的书籍,以期从改革的历史、文化传统方面来提升。应当说,今天与读者见面的这部书稿,我自己并不是很满意,但我深知,在学术上每攀登一个高度都是很难的,下一个高度只好留待以后去攀登了。

我想用这样一个例子来体现本书的主题: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在领导俄罗斯的改革过程中,多次向法国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去求教,后来还邀请他到俄罗斯以便亲自聆听“理论指导”。德尼·狄德罗见到叶卡捷琳娜后,“无拘无束,大摇大摆,俨然是

一位能与女皇平起平坐的老人。他在女皇跟前高谈阔论,指手画脚,来回踱步,目不斜视”,并多次抱怨叶卡捷琳娜的改革搞得太慢了。叶卡捷琳娜对他说了一段富有哲理并令人深思的话:“狄德罗先生,在您的改革、改良计划中,您忘记了我们两人之间工作性质的差异。您只是在纸上工作,一支笔、一张纸,最多再加一张桌子。纸上的东西是逆来顺受,千篇一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您只管写出来,既不妨碍您的思路,又不会抗拒您的笔锋。我也是写字,但我的字是写在俄国人的脊背上面。人是千变万化的、有喜怒哀乐的生灵,您想好了,他却变了,同样一个主张,适合您,又不一定适合他,所以就不像在纸上工作那样轻巧。”本书亦试图通过对中俄体制转型过程中各种不断变化的复杂因素的分析,来论证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及其深入的途径。

当本书经过几年的修改终于付梓的时候,我要向我的博士生导师萧超然教授致以深深的谢意,有了他的支持和鼓励,我才敢涉足这个“深奥”的领域。另外,我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两位同窗,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李实先生,他的很多原创性的思想使我深受启发;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大树先生,他认真通读了本书的手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关海庭

2003年1月12日于北京大学备斋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研究的主题和基本内容	(1)
二 研究的方法	(5)
三 基本的概念体系	(8)
四 研究中俄体制转型模式问题的意义	(20)
第二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进程的宏观描述	(24)
一 中俄体制转型进程时间内涵的界定和背景	(24)
二 俄罗斯(苏联)体制转型的进程	(27)
三 中国体制转型进程的宏观描述	(55)
第三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社会历史背景的比较	(64)
一 中俄体制转型历史传统的比较	(64)
二 中俄体制转型的国情背景的比较	(75)
三 中俄体制转型的社会政治背景分析	(88)
第四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原因比较	(100)
一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经济原因分析	(100)
二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社会过程 和心理原因分析	(110)
三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体制原因分析	(121)
四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政治文化原因分析	(139)
第五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中重大事件和代表人物评述	(161)
一 苏联解体的体制原因分析	(161)
二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评述	(170)
三 叶利钦改革思想简评	(179)
四 俄罗斯“私有化”评述	(192)
五 邓小平渐进改革思想研究	(205)

第六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与国家控制能力·····	(228)
一 两种体制转型方式与国家财政控制能力·····	(229)
二 两种体制转型方式与国家的法制化能力·····	(238)
三 中俄两种体制转型方式与国民文化的整合能力·····	(250)
第七章 中俄两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一)·····	(257)
一 中俄两种体制转型模式的社会后果·····	(257)
二 体制本身的约束条件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	(272)
三 中俄两国国情的特殊性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	(287)
四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的国际背景与渐进转型模式的 合理性·····	(291)
第八章 中俄两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二)·····	(297)
一 中俄两国转型时期贫富分化的状况·····	(297)
二 中俄两国贫富分化的最基本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	(305)
三 中俄两国居民贫富分化与社会中间阶层·····	(315)
四 中俄两国居民收入贫富分化与社会稳定·····	(319)
五 中俄两国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基本思路·····	(323)
第九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的国际比较·····	(328)
一 第一个层次:同其他不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	(328)
二 第二个层次:同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国家转型的比较·····	(337)
三 第三个层次:同采用激进转型模式比较成功的国家 进行比较·····	(341)
四 俄罗斯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论中俄体制转型问题·····	(345)
第十章 中俄两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途径·····	(352)
一 俄罗斯渐进转型模式的全面实施·····	(353)
二 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伟绩及局限·····	(360)
三 俄罗斯经济发展深层次的障碍因素·····	(363)
四 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障碍性因素·····	(366)
五 中俄渐进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途径·····	(372)
六 中国体制转型深入的基本原则·····	(388)
主要参考书目·····	(394)

第一章 绪 论

发生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和俄罗斯(前苏联)的体制转型,走过了惊心动魄的历程,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这个过程所反映出来的一般和特殊的规律,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并为人们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和俄罗斯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分别采取了渐进的和激进的两种不同的转型模式,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深入研究这两种转型模式及相关问题,对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的继续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研究的主题和基本内容

本书定名为“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涉及非常广阔的领域。本书旨在通过中俄体制转型的比较研究,论证大国体制转型渐进优于激进,特别是中国的体制转型渐进优于激进。

体制转型模式的选择是个很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谓体制转型,特指原来实行计划经济、采用计划体制管理的国家向市场经济及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激进的体制转型模式“是通过一场迅猛的改革潮流,用市场经济的雏形取代中央计划经济”^①,特别是迅速地私有化政策和价格体制改革。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经济体制乃是一个整体,必须整体条件(自由价格、自由企业、宏观调控、竞争的市场环境)都具备时才能发挥作用。渐进的体制转型模式则是“分领域、分地区地推行转型计划”,“由于市场体系的体制建设部分已经到位,市场经

^① 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 页。

济会缓慢然而稳定地扩大到经济中的其他部分”^①。

如果仅从最一般意义上分析,很难断定渐进的和激进的两种体制转型方式孰优孰劣。波兰于1990年实行激进的转型模式,其通货膨胀率到1995年,就下降到了27.8%,到1997年,又下降到了14.9%。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就开始正增长;从1992年至1998年末,每年以超过5%的速度增长^②。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的帮助下,也采用激进的转型方式,迅速地转变为市场经济。越南采用渐进的转型模式,“1986年开始实施一个改革计划,起初是在农业部门进行有限的变革,到1989年就加大了范围及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内,改革取消了集体化,把土地交给了家庭农场经营;它还放开了绝大多数物价;允许并鼓励新的私营企业进入很多领域;开放贸易和投资体制;统一汇率并将货币大幅度贬值;削减财政赤字,降低国内信贷的增长率;把利率提高到正的实际水平,而且为国营企业制定了财经纪律,解雇了数十余万的工人。这些措施稳定了经济——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降到了10%以下——并恢复了增长。自1991年以来,越南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③。匈牙利在转型模式上是个有争议的国家。匈牙利从1968年就开始了经济改革,价格体制改革从1975年就开始了,到1988年为止,匈牙利已有80%的商品实行自由价格,不过国家的各种价格补贴还存在。1990年又进一步开放商品价格。总的来看,匈牙利属于渐进转型模式的国家。但匈牙利的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至1993年都是负增长,到1996年,增长率也没有超过3%。中国实行渐进的转型模式,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

上述统计资料引申出本书的研究主题:判断转型模式的优劣,一定要同转型国家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初始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一般说来,国土面积大、国情因素复杂的国家,比较适合采取渐进的转型模式。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受传统文化和计划体制传统影

① 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0页。

② [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著:《从休克到治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页。

③ 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1页。

响深远的国家,更应实行渐进的转型模式。因为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实践已经证明,体制转型的软约束比硬约束更重要。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问题。体制的硬件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完全转变,但如果软件严重滞后,体制转型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不过,渐进转型模式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既然渐进转型模式的进程是依靠国家权力的介入来控制的,那么在渐进转型模式深入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如何退出并通过间接手段进行有效控制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搞不好,既得利益阶层和国家权力就有可能成为转型深入的阻力。只有通过法制手段规范国家权力,不断培育人们的市场意识,渐进转型模式才能深入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对大国体制转型渐进优于激进论点的论证,题目也是很大的,因为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本书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大国体制转型制约因素的分析,特别是传统文化等制约因素的分析,来论证大国体制转型渐进优于激进。本书在论证上述主题过程中,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 中俄体制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形成的原因分析;2. 中俄体制转型过程的宏观描述和社会后果的比较;3. 中俄体制转型过程中重大事件和代表人物的比较;4.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与国家的控制能力;5. 中俄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6. 中俄两种体制转型模式的互相借鉴;7.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国际比较;8.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途径和具体措施。

本书在论述上述问题过程中,主要想表达以下观点:

第一,通过对中俄体制转型模式形成原因的分析,论证对体制进行不断改革,坚持制度创新,具有深远的社会发展意义。中国和俄罗斯采取了不同的转型模式,并且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这其中固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诸如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或者决策失误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苏联前几代的领导人,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他们从整体上思想僵化,拒绝改革,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体制改革的时机,并且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导致体制的积重难返,为后来改革者的成功留下比较小的余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对体制转型的失误是要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但这种失误很大程

度上也是长期体制僵化所带来的后果。中国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的原存体制,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没有造成体制本身积重难返的局面,加之邓小平在改革之初的正确决策,使中国走上了渐进改革的光明坦途。通过这种比较,使我们牢固树立体制创新的思想观念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通过对中俄体制转型的不同国情背景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中国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从一般意义上说,中俄都应该采取渐进式的转型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用激进的转型模式,人们的价值观念跟不上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从而加剧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恢复。但这其中还有一个社会承受能力的问题。尽管俄罗斯采用激进转型模式,付出了高额的社会成本,至今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俄罗斯终究挺过来了,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中国如果采用激进的转型方式,这个“关”根本就闯不过去。因为俄罗斯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俄罗斯在经济最困难的1991—1993年,仅在莫斯科就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在郊外的别墅里从事农副业生产,从而缓解了农副产品紧张的状况。俄罗斯缓解经济危机的措施主要有三条:1. 大量出口原材料,换取外汇;2. 大量举借外债;3. 变卖国有资产。从总的方面说,俄罗斯人的生存余地是非常大的;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采取渐进转型是惟一的选择。

第三,通过对中俄体制转型经验教训的总结,找到中俄两国将体制转型引向深入的途径。中俄两国的体制转型正在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在转型之初具有发展潜力的“落后的优势”;而俄罗斯经历了挫折,目前具有“代价的优势”。中国面临着如何保持前一阶段改革的成果,闯过政治体制改革“难关”的任务;俄罗斯则面临着如何迅速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增强自信心的任务。两国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但都是十分艰巨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法制,走法治化的道路是两国共同的选择。

本书虽然是对“中俄体制转型的比较研究”,但其落脚点还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通过比较研究,探讨大国体制转型中的一般规律,

为中国体制转型的深入提供借鉴。

二 研究的方法

(一) 研究方法的一般描述

目前国内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方法论,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关于人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的理论。它包括辩证决定论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等。这些方法的综合应用能够把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梳理得十分清楚,使人们对历史现象有一个准确的、宏观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至今没有任何一种宏观的方法能与之相比。当然,任何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第二,比较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比较的角度立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看成是一个回应西方现代化模式挑战的过程,也就是挑战—应战的过程。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建构的宏观研究框架比较完整,同时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同目前中国经济建设联系更为紧密,能够有效地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主要是难以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模式,把现代化的过程当作向西方模式演变的过程。第三,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方法。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通常被概括为市民社会理论。这种方法以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性质为基础来建构社会发展的历史,关注的是相对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里,市场经济以及日益完善的法律保障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复兴的直接导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化运动。这种理论受到中国国史研究学者的关注是1992年以后的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民主化必将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目前村民自治实践的发展就显示出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借鉴意义。第四,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家主张把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以

解释经济增长,从而形成新制度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家把这种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形成了新制度主义。目前这种方法已在中国政治学和史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它有两个中心概念:“产权”与“交易费用”,主张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应该从制度变迁中寻找原因,并且强调制度因素中“无形规则”对“有形规则”的制约。

由此可见,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存在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到底采用何种方法,要取决于特定的国情背景、时代特征和学科特点。具体来讲,中国的基本国情可以概括为:国家特别大,历史特别长,人口特别多,发展特别不平衡;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理解为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时代,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的无疑对我们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就学科特点而言,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其性质是属于专门史,但研究的内容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方面面,所以又是综合性的。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是一个严重受传统制约的国家,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法治文化。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去,迫切要求我们建立和健全全民族的法治意识。因而,国史研究更应该关注现实问题,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主义的某些观点、主张,对我们今天的借鉴意义更为明显,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 中俄体制转型中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

毫无疑问,研究中俄体制转型,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对社会存在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研究。

首先,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俄体制转型的比较,自然涉及比较研究的方法。

本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其理论依据在于:

第一,不同国家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结合。所谓统一性,主要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尽管各个国家由于种

种原因,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理位置、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仍然有共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的特征。另一方面,各国具体的历史发展又具有多样性,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历史发展的这种共同性与差异性,构成了比较研究切实可行的科学依据。

第二,不同国家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国进入同一社会形态有早有晚,发展程度有充分与否之别。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你追我赶,后来者居上,一幅曲折前进的画面。先进入某一社会形态的国家为行将进入者预示发展的大致方向,而后进入者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世界历史的不平衡性也是比较研究可以进行的实际前提。

第三,历史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大至社会形态,小至具体的某人某事,均处在互相联系之中。历史上的各种事物不仅在时间上以先后之序相互联系着,而且还在空间上以对周围事物的依赖性相互联系着。历史无论从纵的发展还是从横向看,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均可作比较。“相比较而存在”是客观的实际。

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著名比较史学专家马克·布洛克指出:历史除非能在“确立现象之间关系的解释方面取得成功”^①,否则就无法理解。他还指出,通过比较才能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②。但还要看到,比较研究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从比较的前提上分析,只有是“共同规律起作用的事物”、渊源上相联系的事物、“相互有影响的事物”才能进行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比较前提的重要:“倍尔西阿尼所以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正是因为她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们把她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的修养作了评比,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虽然在这里也可以有比较,但只是人与一般青蛙之间的比较……只有在某一种情况下才谈得上个人与

① 转引自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② 同上书,第130页。

个人之间的比较,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是他们的种特性或类特性的比较。”^①从比较的过程上分析,比较的事物应该是具体的。事物之间的异同,有现象的也有本质的,科学的比较不要限于单纯地罗列一些表面的异同现象,而是要透过现象分析原因。这就要求把比较的事物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是关系到在比较研究中是否坚持唯物主义原则的问题。同时,还要注重比较事物的具体环境的研究。比较研究固然是将事物中最主要的比较点找出来研究,“但因各人观察点不同,其所注重之要素不同”,“何为重要比较点,尚无定论。比较之后的优势,也无定论”^②。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注重具体环境的研究。

同时更应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具有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中国和俄罗斯社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两国都曾经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社会跳跃,从落后国家进入到社会主义;两国都具有东方社会特点:中国是典型的东方国家,俄罗斯是具有东方性质的社会,同西方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两国从国土、人口等方面衡量,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不同于大多数中小国家;两国都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相对落后的国家,不同于英美法等早期工业化国家;两国在自然资源的总量上都有一定的优势,不同于日本等资源贫乏的国家;两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成为体制转型的重要内容,不同于瑞典等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些问题都要研究,以找出对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多层面的因素。

三 基本的概念体系

(一) 体制(制度)

所谓制度,是指“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③,而体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理解。体制的微观理解更具有操作性,主要是指各种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和具体划分的状况,是实现国家能力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8页。

② 沈乃正:《比较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15页。

③ 参见胡希宁编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第二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